

# 试论政治与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互动关系

□詹永媛

[摘要]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政治斗争、政治统治、政治文化心理影响和制约了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同时,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又反作用于政治,推动了民族独立的进程,动摇了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促进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关键词] 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政治斗争;政治文化;政治民主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4)06-0123-05

## On Interaction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Anti-Japanese Literary and Art Campaign in the Region Governed by the Kuomintang (KMT)

ZHAN Yong-yuan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anti-Japanese literary and art campaign in the KMT region was influenced and suppressed by the political struggle,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cultural psychology in the KMT region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Meanwhile, the anti-Japanese literary and art campaign reacted on politics,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shaking the government of KMT, and accelerating China's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Key Words:** KMT region; anti-Japanese literary and art campaign; political struggle;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democracy

### 抗

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与政治息息相关,政治既影响着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抗战文艺运动同时也对中国政治发展予以重大的影响。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在分析抗战时期国统区政治特点的基础上,探讨政治与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互动关系。管窥之见,以求学界同仁指正。

### 一、抗战时期国统区政治的特点

政治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力的一种社会关系。”<sup>[1](P8-9)</sup>它的具体外延形态主要体现为政治斗争、政治统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等。政治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属于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抗日

战争时期,国统区政治在政治斗争、政治统治和政治文化方面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 1. 民族斗争为主,阶级斗争为辅

政治斗争是政治行为的主要表现之一,它由利益矛盾和冲突引起,围绕着特定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展开,表现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等。“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以咄咄逼人之势大举入侵中国,中国的大片大好河山,相继沦入敌手。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其灭亡中国、独霸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外族的入侵,使民族矛盾凌驾于阶级矛盾之上,在国家民族利益、国家主权面前,中国国内各阶级、阶层、各党派暂时将阶级、党派之争置于次要地位,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中。“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形成。这场战争持续八年之久,其间国共两党虽有三次摩擦,但阶

级斗争仍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一直是首要的政治斗争和政治任务。

### 2. 民主与专制并存

政治统治是政治的又一外在表现形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政治统治表现出专制和民主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由于共同抗日的需要,在抗战防御阶段,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民主,如承认党派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共产党在西安、武汉、南京、桂林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给予人民一定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设立各级民意机关,使其他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一定程度上得以参政议政。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以不打破一党专政、专制独裁为前提的,因此,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增强,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有所动摇。其鼓吹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对民主、自由,为维护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提供理论根据;制定反动的政策法规,建立反动的机构和特务组织从政治上控制人民的自由,各级国民参政会也成为摆设。其政治统治的专制性和政治上的倒退日益明显。

### 3. 爱国主义政治情感高涨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sup>[2] (P29)</sup>影响政治文化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重大的政治事件,二是政治系统的控制,三是政党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将中国的大多数民众都卷入了政治生活之中,甚至那些平时政治兴趣淡漠、无意过问政治的社会成员也涉足政治的洪流,对政治倾注非同一般的热情,这种热情引发了社会总体政治文化的急剧变化。在战争的炮火中,爱国主义的基本政治情感被强化,抗日成为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各阶级、阶层共同的政治态度。与此同时,抗日战争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也导致中国民众对国民党以及它所推崇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价值观的厌恶和否定,并爆发出对人民政治权力的热切渴望。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其一定的合法地位,以公开、秘密的形式宣传和鼓动民主、抨击专制主义政治价值观,使追求政治民主成为这一时期显著的政治文化。

## 二、政治对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影响

国统区政治的上述特点对抗战文艺运动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 抗战文艺在战争中产生,运动中心几经分散和转移

正如《抗战文艺》发刊词所说的“在震天动地的

抗战炮火声中,必须有着和万万千的武装健儿一齐举起了大步的广大的文艺的队伍;笔的行列应该配布于枪的行列,浩浩荡荡地奔赴前敌而去!满中国吹起进军的号声,满中国沸腾战斗的血液,以血肉为长城,拚头颅做炸弹,在我们钢铁的国防线上,要并列着坚强的文艺创作的堡垒。”<sup>[3]</sup>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需要激励民心、凝聚民力,需要强国民族脊梁,抗战文艺正是对这一呼唤的积极回应。因为文艺具有独特的宣传、教育、鼓动作用,通过文艺可以“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行,造成全民族的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的胜利”。<sup>[4] (P12)</sup>同时,抗日战争又赋予了抗战文艺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以群认为报告文学“是从民众的反日,抗日运动底土壤上产生,允吸着抗日斗争底乳浆而成长起来的。”<sup>[5] (P1)</sup>这一分析事实上也是对抗战文艺产生、发展原因的一个理性思索。一方面,抗日的烽火点燃了文艺工作者内心的爱国主义热情,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责任感,激发了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欲望和冲动。战争也使他们与社会现实和广大民众紧密相连。他们走出“象牙之塔”、走向街头、走进农村、走上前线。他们看到了烽火,听到了炮声,闻到了血腥,经历了苦难。由此,他们的生活得以丰富,他们的经验得到积累,而这一切正是创作之源,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之所在。另一方面,战争造成的文艺工作者的大流动,使得“京派”、“海派”、“东北作家群”等不同艺术风格的艺术家们相聚一堂,获得了一个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绝好时机,给文艺创作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拓展的眼光。一句话,抗日的烽火孕育、滋养了抗战文艺。

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既根源于抗日战争,服从于抗日战争也受制于抗日战争。受战争形势和战区分割的影响,国统区抗战文艺的中心呈现出分散和不断转换的特点。“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化中心主要集中在北平、上海等少数几个中心城市,抗日战争的炮火无情地摧毁了原有的文化中心,迫使文艺工作者辗转各地,建立新的活动据点。而这些活动据点因战区的分割,处于分散状态。在抗战的防御阶段,各地文艺工作者汇聚武汉、广州,使两地一跃而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武汉、广州沦陷,受战火的威逼,文艺工作分别迁徙到大西南地区和华南、东南的部分地区,因而重庆、成都、昆明、桂林、曲江、永安、金华等地的抗战文艺运动蓬勃发展。抗战进入最后阶段时,桂林“文化城”陷落,大西南文艺中心也岌岌可危,而处于“孤悬半壁”危局的东南地区的文艺运动因战事的需要又出现了新的高潮。

2. 抗战文艺运动在反对国统区的文化专制斗争

中发展

在抗战的防御阶段,由于国民党有限地开放了民主,文艺运动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空间,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迅速蓬勃发展。进入相持阶段后,为配合政治上的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文化的控制。一是颁布了《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图书杂志审查原稿审查办法》、《杂志送审须知》、《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出版品审查法规与禁载标准》等一系列的政策法令法规。二是建立起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新闻检查局、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等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具体实施对文化运动的控制。三是提出法西斯主义的“三民主义文艺”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统区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被剥夺。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41年6月,被查禁的书刊960余种,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不准上演的剧本160种。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国统区进步文艺界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白热化,为求得文艺运动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他们不约而同地关注言论、出版自由,与文化界同仁一道开展了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他们或者以祝寿会、纪念会、读书会等各种方式强烈呼吁出版,言论自由,如1941年在国统区各地举行的郭沫若诞辰50周年和创作生活25周年庆祝会就是一场文艺界反文艺专制主义的斗争;或者以小说、诗歌、戏剧、杂文、漫画等文艺形式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如话剧《屈原》的演出就是投向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枚重磅炸弹。更为重要的是,文艺界还公开地抵制国民党的新闻书报检查制度。1944年5月重庆进步文化界发出《对言论出版自由意见书》,《意见书》明确指出:“我们为民族前途,也为文化前途,特请求政府根本废除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开放言论、出版、研究及公演之自由。”同月,78位文化名人联名发出《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十二中全会请愿书》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禁令,其中包括不少像郭沫若、茅盾等这样的文艺界名流。

一言以蔽之,由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国统区文艺界反文化专制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在反文化专制的斗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并在反专制的斗争中走向与民主政治运动的结合。

3. 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受政治文化心理的制约

政治固然有时可以直接干预文艺活动,但政治最终是国家、政党等政治实体所构成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通过营造某种流行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来对文艺施加影响的。作为引导和驱动人们行为的心理动机,政治文化心理影响着文艺创造

者的文艺策略、影响着文艺受众的需求,进而对文艺发展起导向的作用。

众所周知,文化人的文化主张或多或少都会揉入某种政治情绪,尤其是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需求面前,政治情感更具有无可抗拒的感召力。爱国主义的政治情感和抗日民主的政治态度决定了国统区文艺界人士的一个共同的价值原则和审美取向,这就是一切为了抗日救亡。正如欧阳凡海所说:“我们曾不断加紧技巧、形式等等的研究,注意各方面问题的发掘,各种材料的搜集,以使我们的文学艺术这一武器更为锐利,我们要使这一切的研究、注意都能服从于抗战,这是一定不移的原则。”<sup>[6]</sup>正是这种自觉形成的对战时责任的体任,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方向和工作方向。

其次,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还通过影响文艺受众的需求来制约文艺运动的发展。文艺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消费是它的构成要素之一,因此,文艺必须关注消费主体的需求,否则它就难以发展、难以盛行。抗战时期,国统区民众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左右着他们的审美心理,使他们在审美上具有共性,这就是对民族解放问题的关照。凡是内容顺应他们的政治取向,能表达他们所珍视的政治情感的作品就会广受欢迎,反之,就会遭遇被冷落和批评的命运。在桂林,出版进步书籍的生活书店读者盈门,而国民党开设的国防书店却是门可罗雀,被称为“鬼都不上门”的“阎罗王的饭店”。这一鲜明的对照就是对当时民众对进步文化的需求的最好注解。国统区文艺受众审美心理需求的信息以多种方式反馈给了文艺工作者,使他们自觉地走出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面向广大工农群众调整自己的文艺视野、风格和形式,以满足文艺受众的审美心理需求。

国统区民众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决定了文艺发展的基本方向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弘扬和深化民族解放意识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主题,即使是后期汇入民主运动潮流也是围绕民族解放这一主旋律。当时,“文艺必须为抗战,抗战需要文艺”这一流行于当时的口号成为一切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公认的律令,稍微有脱离这一“律令”的言论和观点出现,文艺界就会群起而攻之。国统区文艺界对梁实秋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沈从文的“反对作家从政论”、施蛰存的“文学贫困论”等的批判就是明证。文艺工作者们自觉遵守这一“律令”,把与现实社会人生问题关系密切的、与战争有关的方方面面的素材,纳入自己的视野之内,把爱国主义、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反侵略战争与反专制独裁统治融为一体。一些文艺家还放弃了探索多年的艺术风格以适应战时的需要。如张恨水不再沉醉

于儿女情长,写出了一系列如《八十一梦》那样的歌颂抗战,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作品;戴望舒也走出迷惘的“雨巷”,走进战斗者的行列,写出了《灾难的岁月》那样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的战斗诗篇等。二是文艺回归民众,向大众化的方向发展。为实现激励民众、动员民众的目的,在“我们要把整个的文艺运动,作为文艺的大众化的运动,使文艺的影响突破过去的狭窄的知识分子的圈子,深入于广大的抗战大众中去!”<sup>[3]</sup>的口号声中,街头诗、活报剧、歌咏、漫画等大众文艺形式应运而生,通俗文艺读物大行其道,群众性的宣传活动蓬蓬勃勃。文艺真正走到了民众中间。

### 三、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对政治的影响

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在抗日的炮声中产生和成长,它既受制于政治,又影响和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凌辱,民族不独立,国家不富强,自由、民主更是远离人民。因此,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政治民主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所追求的两大目标。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通过报纸、杂志、书籍、戏剧表演、电影等各种政治社会化的媒介,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对国统区民众进行政治教化。她既提高了政治信息的普及化程度,激发人们的政治兴趣,又以真实、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去打动人、感染人,熏陶人,从而起到强化和巩固国民的民族独立意识、反封建意识和民主意识的作用,并因此影响、改变民众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进而影响中国政治的发展。

#### 1. 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独立的政治目标更直接地表现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八年的抗战中,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正如夏衍所说:“抗战以来……文艺不再是少数文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sup>[7]</sup>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为抗日而生,以抗日为己任,在内容上强调反帝意识和民族意识,并以大众化、通俗化的形式普及到广大民众中。以文学和戏剧为例,文学作品如《山野》、《边陲线上》、《他死在第二次》、《旅途通讯》、《劫后拾遗》、《西线风云》,戏剧如《台儿庄》、《八百壮士》、《法西斯细菌》、《风雨同舟》、《天国春秋》、《忠王李秀成》等,它们或控诉日军侵华暴行及其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传达出中华民族危难的时代信息,或痛斥汉奸卖国贼,批判民族劣根性中的

奴性思想,揭示汉奸卖国给中国抗战带来的恶劣影响;或讴歌历史和现实抗敌保国的民族英雄……这些作品炙烤着每一位具有良知的中国人的灵魂,点燃了民众对祖国的炽热之情,唤起了他们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患,提升了他们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总之,抗战文艺运动在国统区掀起了一场新的民族意识的启蒙运动,这场新启蒙运动的伟大之处在于:把思想启蒙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强调民族利益、群体利益高于一切,强调凝聚群体战胜凶恶敌人。从这个角度看,其影响力和号召力是史无前例的。正是这一民族意识的思想启蒙,强化了民众的爱国行为,动员和激励了千千万万的民众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鼓舞着千千万万的前线将士奋勇杀敌。也正是这一民族意识的思想启蒙,使民族独立意识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全民族的共识,而这种全民族的独立意识正是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必备的思想基础。从此,任何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言行都会受到全中国人民的唾弃,任何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举动都会受到全中国人民的奋力反抗。

#### 2. 动摇了国民党的政治统治

政治学理论认为:一个政治体系要想保持稳定并有效地履行其功能,需要以一定的政治文化为条件。也就是说政治文化是政治秩序稳定的基础,当社会的政治文化使得群众对当局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时,正常的政治秩序就会丧失。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正是通过对民族整体意识的弘扬,对反封建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呼唤,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揭露动摇了国民党政治秩序稳定性的合法性基础。

抗战初期,民族意识的张扬是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主题。以1938年4月16日张天翼在《文艺阵地》上发表小说《华威先生》为开端,国统区文艺向以憎恶之情鞭挞黑暗现实的方向转变,并在40年代初形成高潮。茅盾的《腐蚀》,郭沫若的《屈原》,陈白尘的《升官图》、《结婚进行曲》,吴祖光的《捉鬼传》,曹雨的《雷雨》、《蜕变》,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宋之的的《雾重庆》,臧克家的《宝贝儿》,萧乾的《林炎发入狱》,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等文艺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将锋芒指向国民党政治的积弊、官员的腐败和专制统治的残酷,将中国现代文艺的政治批判性推向前所未有的鲜明程度。这些文艺作品将国民党的贪婪与腐败,专制统治“吃人”的罪恶与老百姓淋漓的鲜血展现给读者和观众,起到的教育作用和对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杀伤力是显而易见的。否则,国民党当局就不会制订《文化纲领》、《文艺政策》,限制进步作家斥责国民党的黑暗现实。她们使民众透过现象和事实看到了政治系统的专制性

质与国民党的无能及其政权的腐败,并因此产生了对国民党及其政治统治的憎恨、厌恶,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和疏离意识也在增强。“我骂这个世界!我要打烂这个世界!”正如陈白尘的五幕悲喜剧《结婚进行曲》中所喊道的那样,国民政府开始失去了社会的认同感,战后不久更是众叛亲离,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势不可挡。

### 3. 促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为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提供了精神动力。如前所述,文艺工作者们用他们的作品揭露和抨击专制政治,唤醒民众的民主意识,使民主意识深入人心,使民主政治成为民众普遍追求的政治信仰和理想。正是因为这一政治信仰的建立,抗战后期国统区人民才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取消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以高昂的情绪和不屈的斗志参加到争取民主宪政的政治运动中。抗战胜利后,国统区争取民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与抗战文艺运动的启蒙也是密不可分的。

同时,国统区文艺界人士还积极投身到民主政治运动的政治实践中,许多像郭沫若、茅盾这样的文艺界名流成为民主政治运动的斗士,战斗在国统区民主政治运动的前列。在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斗争中,国统区进步文艺界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是中国实现政治民主、中国文化发展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障碍,积极地投身到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与民主运动相结合并走向高潮的标志是1945年2月22日重庆文化界发表的《对时局进言》。“进言”由抗战文艺运动的旗手郭沫若起草,并由郭沫若、阳翰笙等登门动员包括茅盾、巴金、老舍、胡风、曹禺等文艺界著名人士在内的300多名文化人士签了字。“进言”实际上就是文化

界的“民主宣言”。“民主宣言”发表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群众的广泛支持,蒋介石为此恼羞成怒,派特务威逼签名者并勒令解散了“文工会”。但从中可见,“民主宣言”给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以迎头痛击,壮大了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声势,并将民主宪政运动推向高潮。■

### [参 考 文 献]

- [1] 王浦劬. 政治学基础[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2] 阿尔蒙德著, 曹沛霖, 等译. 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政策[M].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3] 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一期)[Z]. 1938-05-04.
- [4]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Z].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3.
- [5] 以群. 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A]. 战斗的素描[C]. 重庆: 作家书屋, 1943.
- [6] 欧阳凡海. 论文艺动员的成果缺点及其任务[N]. 新华日报, 1942-02-08, 11.
- [7] 夏衍. 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J]. 自由中国(第1卷), 1938, (2).
- [8] 孔德元. 政治社会学导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9] 抗日战争文化史[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 [10]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 [11] 章绍嗣. 抗战文艺研究60年回眸[J]. 抗日战争研究, 1998, (4).

收稿日期 2004-09-15

[责任编辑 蒙本曼]

[责任校对 黄少梅]

[作者简介] 詹永媛(1966~),女,硕士,广西桂林人,广西民族学院政法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革命史。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上接第117页)

- [20] 张广智. 克利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 [21] 梁启超.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8.
- [22] 尹达. 中国史学发展史[M].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Z].
- [24]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
- [25] 李大钊. 史学要论[A]. 李大钊史学论集[C].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
- [26] 鲁滨逊. 新史学[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64.
- [27] 柯林伍德著, 何兆武、张文杰译. 历史的观念[M]. 北京: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28] 张文杰, 等.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收稿日期 2004-02-25

[责任编辑 蒙本曼]

[责任校对 黄少梅]

[作者简介] 肖宏发(1965~),男,瑶族,广西资源人,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史学理论、中国文化史和文献检索。广西南宁,邮编:530006。